

“社会流动”浅析

刘 洁

(山西大学哲学社会学学院社会学系)

摘要：在当今中国社会，随着工业化、城市化以及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社会流动”日益成为一个受关注与被讨论的话题。本文在对“社会流动”进行概念解释、理论回顾与操作化的基础上，具体探讨了“影响社会流动的因素有哪些？”以及“社会流动会造成怎样的影响？”这两个问题，并对进一步的以“社会流动”为主题的调查之开展给出了一些切实的建议。之后，对当今社会流动过程中暴露出来的一些问题，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

关键词：社会流动；影响因素；正功能；问题；合理

鲍曼在《流动现代性》一书中强调：流动性是当代生活的显著特征。在当今中国社会，随着工业化、城市化以及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社会流动”日益成为一个受关注与被讨论的话题。它与我们的生活关联是如此密切：一方面，我们不断地通过运用个人、群体和社会方面的资源，如教育等，来实现自己的社会流动的目标；而另一方面，既已达致的社会流动又转而深刻地影响了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由此，“什么是社会流动？”“影响社会流动的因素有哪些？”以及“社会流动会造成怎样的影响？”就成了三个相互关联的亟待我们去探讨、去研究、去解决的问题。而我的论述也就致力于在理论回顾的基础上，对进一步的实地调查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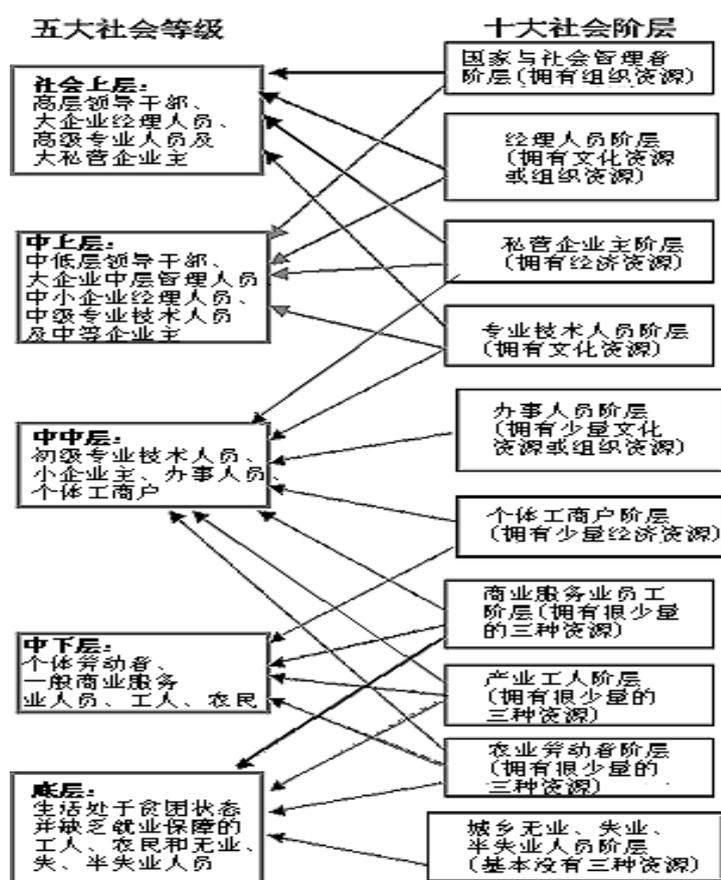
一、概念解释、理论回顾及其操作化

社会流动，是指个人或者群体在包括社会阶层、等级地位等在内的社会关系网络中的位置的改变，即社会个体或群体从一种社会地位向另一种社会地位的转移。它强调的是个人或群体的社会地位的变迁，而并不是单纯地意味着人口学中的“流动”所强调的人在地理空间位置上的变化。依据不同的划分标准，社会流动大致可分为以下三种类型：1. 根据流动的纵横方向，社会流动可分为水平流动和垂直流动（即社会阶层内部的流动和各层之间的流动）。其中，垂直流动又可细分为上向流动和下向流动。2. 根据衡量流动的不同参照基点或主体状况，可将社会流动分为代内流动与代际流动。3. 根据流动的结构程度，社会流动可分为结构性流动与非结构性流动。

社会流动与社会分层密切相关。如果说社会流动主要是从动态的角度来研究社会结构的话，那么社会分层就是从静态的角度进行社会结构的研究的。社会分层结构的变化、调整是通过社会流动实现的。也就是说，社会流动是社会分层的重要机制。

在社会学中，社会分层是指依据一定具有社会意义的属性，将一个社会的成员区分为高低有序的不同等级、层次的过程和现象。许多社会学家都力图通过构建一维或多维的指标来对社会等级次序进行判定和划分，从而得以描述社会分层的结构状况。

我国社会学界对阶层结构的分层研究，是随着阶层的变化而由简到繁、由粗到细，不断完善的。20世纪80年代初期，人们普遍接受的观点是“两个阶级、一个阶层”，即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知识分子阶层。进入21世纪后，我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化引起了学术界的进一步关注。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2002年出版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一书，以职业分类为基础，以经济资源、文化资源、组织资源占有状况为标准，把当今中国的社会群体划分为十大社会阶层，分别是：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人员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和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并将他们分属于上层、中上层、中中层、中下层和低层五种社会经济等（如下图所示）。这种阶层划分标准在当前具有一定代表性。



在开展具体的研究时，我们可以将着眼点放在被访者个人的代内流动上，也就是调查对象本人一生中的社会地位的升降变化情况。为确保能够对调查对象的社会流动状况有一个直观而较全面的认识，可以选取两个横截面——受访者在参加第一份工作时和参加目前的工作时的状况——来收集相关资料、进行分析研究。之所以以工作为截面标准，是因为工作在个体的生命历程中的地位即便不是最为重要也可以说是相当重要的，因此人们往往对自己的工作及与之相关的要素——如经济地位、权力权威、社会声望等——印象较为深刻，这样的选取标准既能保证所收集到的资料有较高的信度，又可以以工作的变动为基础，较好地把握住个体由社会流动所导致的社会阶层的类属情况。

具体而言，笔者认为，在开展研究时，可以以中国社科院提出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基本形态——十大社会阶层和五种社会地位等级——为理论依据，调查受访者在不同时期的职业状况，并以此为基础，划分其所属的社会阶层。同时，在收集受访者的父母基本信息、本人受教育程度以及其他一些与其个人社会流动密切相关的资料的前提下，能够对于影响社会流动的因素与社会流动所造成的影响给出解释与阐述。

二、两个假设与其合理化论证

依照日常生活经验及查阅的相关文献，我将以“社会流动”为主题的研究之假设表述如下：

假设 1:影响社会流动的因素，按其主体分属于微观、中观与宏观三个不同的层面，可分为个体、群体与社会三个方面。

具体而言，个体的教育程度与婚姻状况会对社会流动造成影响；群体的性质（初级群体与次级群体）亦对于社会流动有所作用，其中初级群体中的家庭和熟人朋友这两种类型由于其特殊的性质对于社会流动有着重要的意义。而社会则会从制度和文化的两个方面对社会流动产生深刻的影响。

（一）微观层面——个体方面。

在关于社会人口流动的理论研究中，个体主义的理论视角是其中最为经典的研究视角。它主要以社会流动的个体理性为出发点，“认为人口流动与迁移的主要动因来源于其个体的自主选择，其目的在于实现个体自身的效益最大化。”其中，个体因素可具体分为教育程度与婚姻状况两个方面。

1. 教育程度

美国现代化研究专家英格尔斯在《迈向现代》一书中认为，教育对个人的现代性具有较大影响，学校教育是促成个人现代化的强有力的因素。舒尔茨则认为，用于受教育的花费是为了取得良好机会并获得更大效益的投资，可以将其看作是人力资本的直接投资。同样，在个体的社会化中，学校教育是其中一个必需且十分重要的主体。戴维·波普诺指出，通过正规的学校教育，个体被教与“在这个社会和文化传统中他们所需要的技能和态度”。而在谭璐与陈云芳所撰写的《高等教育与社会流动》一文中则指出，“高等教育具有社会化和选择性的双重功能，通过它的筛选机制，使社会成员分层合理化”，能够促进合理的社会流动。

教育程度是个人所拥有的知识技能、价值观念的主要外在标志之一，影响着他人和社会对个人的角色期望，因而它对于个体的社会流动有重要的影响。

2. 婚姻状况

社会学家孔茨曾说过：“千百年来，人们结婚的一个理由是，单个人仅靠他（她）自己的力量去做每件事情，将无法生存下去。”通过婚姻，两个个体所接触的社会网络会扩大，因之其所掌握的社会总资本——指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所有个别资本的总和——会增加，而这无疑会为个体的社会流动创造更多的条件与机会。尤其是在我国的户籍制度将户籍属性

划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的语境下,许多地区都规定了城乡夫妇在结婚若干年后能够把配偶的农村户籍迁到城市并改为居民户口。因此,婚姻状况对于个体能否实现社会流动以及实现怎样的社会流动的影响是很大的。

（二）中观层面——群体方面

社会群体是处在社会关系中一群个人的合成体。依据不同的分类标准,社会群体可分为初级群体与次级群体、正式群体与非正式群体等类型。本次研究主要关注了初级群体中的两种不尽相同的群体类型对于社会流动的影响。

初级群体是指由面对面的互动所形成的具有亲密人际关系的社会群体。它的特征有:成员有限;成员间有直接的经常的面对面互动;成员之间相互扮演多重角色,表现了全部个性;成员间的交往富于感情;成员难以替代;群体整合程度高;群体控制依靠非正式的手段。初级群体主要有三种类型,分别是:以婚姻关系、血缘关系或收养关系为基础结合成的家庭,在地缘关系基础上形成的关系友好的邻里,由年龄、兴趣、爱好等一致而自愿结合成的伙伴群体。用日常生活中的话语表述,初级群体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家人”与“熟人”“朋友”。

我国社会学家费孝通提出的“差序格局”一词描述了亲疏远近各不相同的中国传统社会的人际格局。“在差序格局下,每个人都以自己为中心结成网络。这就像把一块石头扔到湖水里,以这个石头(个人)为中心点,在四周形成一圈一圈的波纹,波纹的远近可以标示社会关系的亲疏。”而与中心的个体联系紧密的初级群体,因具有高度的整合而便于彼此互相帮助、互相扶持,无疑会对社会流动产生巨大影响。

基于初级群体的基本理论,我认为,在开展研究时,可以重点关注两种宽泛意义上的初级群体的类型:家庭和熟人朋友。

1. 家庭

家庭是人类社会生活中最基础的社会化单元,承担着向下一代提供社会地位资源的功能。在现实生活中,有两种不同类型的家庭:结婚生子后建立起来的生育家庭,个体在其中出生并接受大部分社会化教育的出身家庭。生育家庭对于社会流动的影响可以划归为上已提及的个体方面的婚姻状况的作用,在此处讨论的是出身家庭对于社会流动的影响。

英格尔斯指出,父亲的教育、家庭的环境这两点因素对个人的现代性有较大影响。并指出,虽然这两者的熏陶对个人现代性形成的直接影响不大,但间接影响却是很重要的。家庭为个人一生的社会化奠定了重要且坚实的基础。我认为,家庭中父母的受教育程度、阶层地位等特征对其子女的社会流动具有重大意义。

2. 熟人朋友

社会成员在进行社会互动时,根据参与者之间人际关系的性质之不同,可分为情感关系、工具关系和混合关系三类。其中,混合关系既有情感性成分,又有工具性成分,在不同的情境中满足了社会行动者的表意性需求与工具性需求。而我们所指称的“熟人朋友”就是混合关系的典型代表。一方面,在熟人朋友圈子内部,成员彼此高度信赖,满足了其在安全感、归属感等方面的表意性需求;另一方面,正如清华大学孙立平教授在《断裂》中所言:“许

多人还记得，20世纪80年代广东流行一句名言：‘关系就是生产力。’用今天学者的话来解释，就是社会资本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也就是说，这个圈子会通过其所掌控的社会资源，满足个体的工具性需求，在社会流动方面发挥着不容小觑的作用。

（三）宏观层面——社会方面

有学者认为，从一定意义上讲，引起社会流动的最根本的原因来自社会，只有从社会总体上分析流动才能真正把握其本质原因。制度条件和文化条件是影响社会成员社会流动的主要社会条件，这二者具体体现为就业制度和职业声望观。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社会发展室主任李炜在《社会流动的影响因素》一文中，对制度因素对个人的社会流动与其社会地位的获得所产生的影响做了分析，认为：1. 户籍制度是对社会流动影响最为明显也是历时最长的宏观性因素，它极大地限制了社会成员的发展机会；2. 家庭、阶级出身也是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影响社会流动的主要宏观因素。综上所述，我认为，宏观社会的相关机制（制度条件和文化条件）会从根本上影响到社会流动的实现。

假设 2: 合理的社会流动，对于个体、群体与社会均具有正功能。

功能是指在某个系统中部分对整体所发挥的作用，简单地说，就是某一部分的存在和变化对整体及其他部分所发挥的作用。其中，有助于某系统或群体的整合与内聚的，所发挥的是正面的、积极的、支持性的作用的就是正功能；而对某系统或群体具有拆解与销蚀作用的则是负功能，亦称消极功能。

合理的社会流动是指能够促进社会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的流动机制。它具有量和质两方面的规定性：量的合理性，即社会流动既要满足社会发展需求又不超越社会承受力；质的合理性，指社会流动所体现的原则要与社会的基本制度要求相适应。在现阶段，合理流动的基本原则是机会平等原则。

基于以上分析，我认为，合理的社会流动，不论对于个体、群体还是社会而言，均具有促进其整合与发展的正功能。

在个体与群体方面，合理的社会流动能够提高个人和群体的生活水平，优化个人与群体的生活方式。这一点表现在物质与精神两个层面。就物质层面而言，合理的社会流动能够增加个体及群体的经济收入；就精神层面而言，合理的社会流动有助于形成群体的集体意识——即个体成员对集体的认同感与归属感。

于社会而言，合理的社会流动是社会良性运行的重要协调机制。它既有助于消除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同时有利于提高社会整合程度，给社会系统注入活力，从而推动实现高水平的社会良性运行。

意大利社会学家 V·帕累托的“精英循环理论”则从另一个侧面论述了社会流动对于社会稳定与发展的重要性，这里的“精英”意指那些具有特殊才能，在某一方面或某活动领域具有杰出能力的成员。他指出“人类的历史乃是某些精英不断更替的历史：某些人上升了，另一些人则衰落了。”在这个过程中，精英与非精英之间就会发生某种循环。他这种现象称为“精英循环”。帕累托认为，精英与非精英之间的流动是必然的，这种循环“使得那些

从某集团过渡到另一集团的人把原集团所具有的某些倾向、情感、才能带到新的集团中来，从而赋予新集团以新的活力”，即这种流动是造成政治稳定、保持社会平衡、激发社会活力的基本而重要的因素。

总之，我认为兼具量和质两方面的合理性的社会流动，是现代社会重要而有效的协调整合机制，它能够在缩小社会不平等差距、促进社会整合与团结、激发社会活力与新力、构建和谐社会等方面发挥出积极的功效，具有显著的正功能。

三、相关问题及建议

中国社会学会会长陆学艺在《研究社会流动的意义》一文中指出，“现有的社会流动机制哪些是合理的，哪些还不合理，需要进行怎样的改革和调整，这些问题都是处于关键时期的我国需要认真研究并关注的。”受此启发，我认为，在研究过程中，我们除要注意观察合理的社会流动对于个体、群体与社会均具有的正功能外，还应关注在流动中一些可能会暴露出来的问题。因此，笔者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及与之相关的调查（我曾参与过一次对太原市市区内的64个样本的实地调查），针对一些流动中业已显现的问题，提出了一些较为可行的建议。

1. 中产阶层的培育与扩大

中产阶层的划分标准通常有两个，一是职业，二是人均或家庭收入。通俗地说，中产阶层在经济地位、政治地位和社会文化地位方面均居于现阶段社会的中间水平。陆学艺则认为：“中产阶级是一个职业概念，不能以钱来划分，用钱划分是说不清楚的。”而关于中产阶层的社会功能，也引起了许多社会学家的关注：马克思认为，正是由于中产阶级的瓦解，造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两极化，这是导致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重大冲突，从而引发社会动荡和社会革命的前提条件之一。美国著名社会批判学家米尔斯则从中产阶级的性格特征——消费的前卫和政治的后卫——出发，指出了中产阶级的社会功能——中产阶级的出现和壮大对资本主义的社会发展起着重要的调节作用。而在我国社会转型的背景下，对于中产阶级的研究分析将变得越来越重要，因为“这样一个社会群体所发挥的社会功能，将影响中国社会的社会稳定与未来发展。”

在这一小节中，我采用了陆学艺提出的“中产阶级是职业概念”的理论，以一次对太原市市区内的64个样本的调查为例，在将中国十大社会阶层划分为上层、中上层、中中层、中下层和低层五种社会经济等级（见表3-1）的前提下，进行了相关论述。

表3-1 目前的工作所属的社会地位等级

社会阶层	社会地位等级	频次	有效百分比
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	上层	5	7.8
专业技术人员阶层	中上层	4	6.3

办事人员阶层	中中层	15	23.4
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	中下层	37	57.8
农业劳动者阶层			
产业工人阶层			
警察及军人	待定	0	0.0
不便分类人员	待定	1	1.6
未回答		2	3.1
合计		64	100.0

在将中上层、中中层及中下层合并为中产阶层后，可以得到下表：

表3-2 目前的工作所属的社会地位等级之简化

社会阶层	社会地位等级	频次	有效百分比
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	上层	5	7.8
专业技术人员阶层(中上层)	中层	56	87.5
办事人员阶层(中中层)			
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	} 中 下 层		
农业劳动者阶层			
产业工人阶层			
警察及军人	待定	0	0.0
不便分类人员	待定	1	1.6
未回答		2	3.1
合计		64	100.0

虽然这样的分类略显粗糙，但根据具体的调查结果，我们还是可以从中得出一些有意义的结论。根据此次调查的数据，我们可以得知——在由64名受访者组成的样本中：（1）中产阶层所占的比例是最高的，共计有56人，到达了87.5%的比例；（2）在中产阶层内部，由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和产业工人阶层三者构成的中下层构成了中产阶层的主体。——可见在调查范围内，中产阶层的构成结构还不是很合理，大部分的中产阶层的社会地位等级相对而言是比较低的。

鉴于中产阶层在促进社会和谐与稳定方面所发挥的极其重要的社会正功能，我建议社会与政府应大力培育并努力扩大中产阶层在全体社会阶层中所占据的比例。

2. 力量均衡的社会格局的建立

根据我们的日常生活经验与相关调查，我发现，在转型期的中国，对于求助者而言，熟

人朋友在他们社会流动的过程中起到了不容小觑的作用。

由此，我认为：一方面，合理的社会流动有助于消除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这一机制通过缩小人与人之间在经济地位、权力权威、社会声望等方面的差异，“缓解了由地位差异而产生的隔阂和冲突”。但另一方面，根据调查所反映出的情况来看，在现阶段，不同的个体与群体在社会流动中获取与运用相关社会资源的能力与机会在实质上是不平等的。正如孙立平在《断裂》中所言：“在中国从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开始定型的社会力量格局，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均衡的。这特别表现在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之间。这两个社会群体无论是在对公共政策的影响上还是在利用社会机会的能力上都存在极大的差别。……近些年来，这些力量对国家机构制定政策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在基层，主要是通过“关系”和腐败的形式进行的。……这样的一种力量对比，无疑开始成为目前我们社会中加剧社会不平等的一个重要机制。”这即是说，由于各社会成员的力量的不均衡与不平等机制的形成，会使得目前的社会流动的合理性被削弱，从而造成新的社会不平等，甚至有可能导致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马太效应”。

胡锦涛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0 周年大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其中提到了中国共产党在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的形势下，所面临的“四个危险”——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可以说，这四个危险与在调查中所体现出的熟人朋友对社会流动的影响均有着一定的关联。对此，我们建议相关部门应为建立一个力量均衡、流动合理的社会而努力，促成一种多元化社会力量的形成，拒腐防变。

3. 可能存在的潜一负功能

合理的社会流动在对个体、群体与社会发挥正功能的同时，也会造成一些事先并没有预料到的潜在的负功能。其中，婚姻危机就是典型的一例潜一负功能。

统计数据显示，从上世纪 70 年代末开始，我国离婚人数和离婚率持续上升；截至 2011 年，我国离婚率已连续 7 年呈递增趋势。就在 2010 年，全国 120 多万对夫妻喜结连理的同时，196 万多对夫妇劳燕分飞。目前，北京、上海的离婚率已超过 1/3。对此，中国社科院研究员陈一筠说：“随着社会转型、社会环境变化对婚姻家庭发起的挑战，‘新离婚时代’来临。”他表示，离婚率的提高，反映了社会发展与时代进步给个人生活带来更多的选择机会与自由空间的同时，也带来了人际矛盾与情感风险。

我们再来看看山西省与太原市的离婚情况。据山西省民政厅和山西统计信息网的数据显示，2010 年山西省登记结婚的人数比 10 年前增加了 1 倍多，而登记离婚的人数却是 10 年前的 3 倍多，平均每天有 77 对夫妻分道扬镳。相对其他地区，山西省离婚结婚比并不算高：2009 年民政部公布的数据显示，在 31 个省市自治区中，山西省的离婚结婚比排名倒数第三；2010 年的统计数据显示，山西省 2010 年的平均离婚率为 2.9%，在全国排名倒数十位以内。其中，各市的情况又不尽相同。据 2010 年省人口计生委公布的数据显示：山西省 11 市的离婚率基本呈现“南高北低”的特点。晋城市最高为 6.1%，吕梁市最低为 0.7%。太原市的市离婚率为 1.6%，位居第九；太原市的市再婚率为 10.5%，位列第七——二者均不在前列。专家

分析认为，山西省离婚率这种“南高北低”的特点与经济发展水平、人口流动速度、交通便利程度、观念开放程度等紧密相连。

由以上的数据可以看出，在人们进行社会流动时，他们的价值观念与生活方式等都会相应地发生变化；同时，扩大了的社会关系，也给个体提供了更广阔的社会互动范围，“这在客观上会造成对婚姻关系的疏离。”而这一切都会对既有的婚姻造成冲击，引发冲突，当冲突不可调和时，婚姻危机的发生也就难以避免了。也就是说，社会流动所引发的变化将会直接影响甚至危及到人们的婚姻。对此，有学者总结道：“社会结构变化剧烈之时也是婚姻危机频繁发生之日。”

因此，在确立一个更为合理的社会流动的机制的同时，我们亦应全力避免社会流动的负功能所已经造成的与可能造成的消极影响，从而真正发挥出合理的社会流动对于社会整合与社会运行的积极的协调作用。

4. 建构一个更加公正、合理、开放的社会流动机制

通过上面对社会流动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目前的社会流动从主客观两方面来说均较为合理，由其所形成的社会分层已具备了现代社会阶层的基本构成成分，可以说一个现代化的社会阶层结构正在逐步形成。但另一方面，由于社会流动还存在着一些缺陷，所以建构的这个阶层结构还只是雏形，存在着诸如中产阶层规模较小等现实问题，并不是一个绝对意义上的公平、合理、开放的现代社会阶层结构，它“与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还不相适应，存在引发社会危机的结构性因素”。之所以会存在这一现象，陆学艺认为，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当前中国的社会流动渠道还不畅通，计划经济时代留下来的一些制度性障碍(如户籍制度、就业制度、人事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仍在阻碍着人们向上流动以获得更高社会地位，社会流动模式呈现出新老社会流动机制并存的两重性特点。也就是说，公正合理的现代化社会流动机制尚未形成。”

由此，我们建议社会与政府应大力建构一个更加公正、合理、开放的社会流动的机制，并“在此基础上加快形成一个与经济发展和经济结构变化相适应的公正、合理、开放的现代社会阶层结构。”

综上所述，在确立一个更为合理的社会流动的机制的同时，我们亦应全力避免社会流动已经造成的与可能造成的消极影响，从而真正发挥出合理的社会流动对于社会整合与社会运行的积极的协调作用。

四、总结

我相信，从本文所提出的假设出发，在以“社会流动”为主体的实地调查与整理分析的基础上，无论提出的假设或被证实，或被证伪，或有待于更进一步的分析论证，都会为我们提供一个难得的能够对社会的流动现状进行分析研究的机会；同时，结合结构功能主义的理论视角，对社会流动对于个体、群体与社会所具有正功能与负功能、显功能与潜功能进行分析。希望通过这样的研究，能够为更好地发挥社会流动的正功能并避免社会流动的负功能提

出一些切实可行的建议，从而为构建和谐社会敬献绵薄之力。

社会学家吴文藻先生早就指出：“以试用假设始，以实地证言终。理论符合事实，事实启发理论，必须理论与事实揉和一起，获得一种新综合，而后现实的社会学才能植根于中国土壤之上，又必须有了本此眼光训练出来的独立的科学人才，来进行独立的科学研究，社会学才算彻底的中国化。”笔者希望这次在结合相关调查基础上的研究及与之相关的理论分析，能够为社会实现合理的社会流动、增强社会活力做出自己的一点贡献。

参考文献

- [1] 费孝通. 乡土中国[M]. 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 [2] 陆学艺. 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 [3] 孙立平. 断裂[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 [4] 蔡禾. 城市社会学讲义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 [5] 李路路, 李升. 同质中的分化：当代中国中产阶级 [DB/OL].
http://www.china001.com/show_hdr.php?xname=PPDDMV0&dname=DSGGF41&xpos=65,
2011-10.
- [6] 陆学艺. 研究社会流动的意义 [DB/OL].
<http://www.sociologyol.org/yanjiubankuai/xuejierenwu/luxueyi/2009-04-11/7694.html>,
2009-04-11.

文章来源：作者投稿